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30 年发展回顾

罗润东 郭建强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对市场化改革实践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就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泉。与此同时,它在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典型现象就是,伴随着传统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并且理论研究的规范性不断增强。这一格局无疑将影响到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对经济理论及其政策建议的选择,而且也会影响到政治经济学科自身的发展命运。本文结合我国政治经济学科的发展现状,就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进展做一回顾,以对其未来发展趋势与特征做出某种判断。

作者 罗润东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商学院教授
郭建强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商学院副教授

一、理论发展的实践背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历程

从 1978 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我国经济改革开放走过了 30 年的探索历程,整个时期可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 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 (1978—1984 年)。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性地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的最初突破口首先选在农村,在制度上废除了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将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还交于农民,通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造了农村经济组织的微观细胞。由此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在广大农民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农村劳动力开始寻觅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一是就地转移,形成了乡镇企

业异军突起；其二是跨区转移，由此形成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典型现象“民工潮”。

1979年，国家经委、财政部等六部门在城市范围内进行了企业改革试点，主要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同年，对外开放相应起劲，我国创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之后在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进一步开放大连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

2. 改革开放的扩展阶段（1984—1992年）。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经济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基本方针政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通过改革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成为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价格改革成为整个改革进程的关键内容，我们相继进行了承包制、租赁制和股份制等多种经营形式的试点。通过改革国有企业和培育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国有经济形式，逐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1985年，我国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开放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区域。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阶段（1992—2002年）。

1992年，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标志，我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的关键时期。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人民思想进一步解放，国家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作为这一阶段的重要会议，相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按照这一框架，我国对财政、金融等一系列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经过这些改革，不仅在微观层面形成了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运行格局，在宏观经济层面我们逐渐熟悉并成功运用金融、财政、国际贸易等市场经济调控手段干预和引导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在此期间的2001年，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并融入国际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成功加入WTO。

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阶段（2002年至今）。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快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期。中共十六大提出，新世纪的头二十年的战略目标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一奋斗目标在之后的中共十六届四中、五中和六中全会纲领中以及十七大报告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注重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在具体工作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或改革理论的源泉自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们关于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大创新就是突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教条式理解,通过实践与理论的双重探索,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我国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起点发端于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基本范畴的讨论或争论,由此实现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学者开始着手编写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由此揭开了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与建设的序幕。实际上,我国学者在 1958 年后即开始自己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与理论发展水平,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原则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并不清楚;加之“左”倾思想的禁锢和束缚,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依然存在着“宁左勿右”的错误观念,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理论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几乎是全部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很难谈到创新与发展;只有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理论界在思想解放与百家争鸣的背景下,才真正开始了独立进行经济理论的研究。其变化和发展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1.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阶段。

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次会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重要条件的方针,给经济学界的理论改革增添了新的动力。当时,马克思《资本论》的体系结构是唯一可以学习和利用的理论源泉,因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理论改革中出现了一股“回到马克思”的潮流。在这一阶段有关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争论中,首要问题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①例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首先对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提出质疑。他指出,“斯大林的定义是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正确定义的修改,这种修改是不妥当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经带来了不良后果。我们认为,斯大林把流通排斥在政治经济学对象之外,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独立出来,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之一,都是有问题的,大有讨论的余地。……斯大林同志对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对于生产关系所包含的内容(或组成部分)的改动,是不正确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斯大林同志的错误观点的理论渊源,以

^① 关于研究对象的讨论,最初始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序言中的一段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但在“苏联范式”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被定义为:它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也就是说,它只研究生产的社会方面,即社会生产关系(参见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 3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及它在实践中造成了怎么样的危害。”^① 对此，卫兴华也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必须联系生产力来进行，因为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因此，政治经济学为了科学地研究和说明生产关系，必然需要考察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但考察生产力，是服从于研究和阐明生产关系本身以及它同生产力的适应状况的，而不是为了说明生产力自身。”^② 由此，是否应当加强对生产力研究的强调一时引起了国内理论界的大讨论，这对形成我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起到了明显地推动作用。如 1983 年，全面反映孙冶方经济理论研究成果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的正式出版，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开拓者。

关于方法问题，则是确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学者提出，马克思在阐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曾明确了研究方法 with 叙述方法的区别。如在写作《资本论》之前马克思运用的是研究方法，即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的思维过程；在《资本论》之中马克思使用的则是叙述方法，即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具体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确立，我们现在要掌握的应是其中这个叙述的方法，即由抽象到具体的道路。^③ 对此，谷书堂教授也赞同，但更强调了最终要回到实际中来，既要尊重科学的方法，又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在条件不具备时机械地搬用科学方法。^④ 这样，在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影响和推动下，我国经济学界进入了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和著作的一个高峰期，出现了一批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代表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谷书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即“北方本”，1979 年第 1 版）、张卓元《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1985）、雍文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社会必要产品论》（1985）、蒋学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86）、王珏《必要价值论》（1988 年第 1 卷）等等。按照“北方本”的阐述，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采用以生产、流通（交换）、再生产的动态“过程法”来安排理论结构，从而有别于过去所采用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静态“四环节法”。这样，就更加有利于把以物质利益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线而贯穿于全书的分析中；而且，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改革初期的学者们极力摆脱前苏联教科书的制约，力图重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尝试。

2.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发展阶段。

1984 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后，传统的“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逐渐消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成为经济理论的主要命题。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开始从抽象的生产关系逐渐转向实际经济问题；在具体分析上，更是力求从实际出发以贴近现实，并适当地、有针对性地增加了西方经济发展的现实内容。这应当说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变革的一个新的开端，它直接促成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经济理论的繁荣。在这一阶段，一些经济学者开始反思传统范式中存在的

① 孙冶方：《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载《经济研究》，1979（8）。

② 卫兴华：《关于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载《经济研究》，1981（1）。

③ 张熏华：《〈资本论〉脉络》，序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④ 参见谷书堂：《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探索》，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

一些深层次问题。正如谷书堂在 1995 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新论》前言中所说,“1978 年我和宋则行教授联手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简称‘北方本’。当时曾设想跳出旧的窠臼,建立起一种新的体系,并力求从实际出发,以改革为导向,编出一本能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且在理论上超前的著作来。……但从总体来说,却仍未跳出‘如来佛’的掌心,基本上仍是一套旧体系。在这套体系中,计划经济、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远未梳理清楚,可以说是硬拼在一起的。”^①因而在 1985 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改变了最初在“北方本”第 1 版中所描述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种狭窄的定义,而转向认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所要揭示的经济规律不仅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而且也包括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规律,以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关系的规律。即是说,它的对象应该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讲的生产方式,不是指的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像马克思曾经赋予它的含义那样指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部,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②与此类似,经济学家于光远也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关系的层面,而是需要具体地对我国改革前和改革中的经济体制作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而且,对改革前和改革中事实上存在的经济体制进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性质的分析和批判,则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根据。^③

另一方面,研究内容的扩展也成为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确立的一个重要变革,主要是把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以及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的思想引入原有的政治经济学框架。这种趋向首先反映在 1989 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运行与发展》中。该书重新确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认为“这里讲的社会主义,并非传统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而是指当代不发达或不成熟的社会主义,亦即起始阶段的社会主义。把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当代社会主义经济作为分析的主要对象。”^④同时在分析方法上,该书除了在总体设计上仍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外,更多的是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如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计量分析和比较分析、均衡与非均衡分析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垄断竞争动态非均衡的分析方法”,并认为这种方法不仅适合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而且对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同样也是适用的,从而打破了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分析界限。然而,有些学者却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运行的分析,是在阐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必需范围内来阐述经济运行问题,所以只能限于运行规律和运行的基本机制;而由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来分别研究经济运行的某一方面,则能够对经济运行问题的研究更细微和更具体,所以主张在原有框架外另立分支。^⑤总的来说,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

① 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论》,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谷书堂:《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探索》,前言,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

③ 于光远:《我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载《经济研究》,1986(8)。

④ 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前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⑤ 蒋学模:《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载《经济学家》,1997(2)。

中期这一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和教科书有：谷书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1988年第4版，1992年第5版）和《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1989）、宋则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1989）、雍文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再探索——双重运行机制论》（1990）、王珏《必要价值论》（1992年第2卷）、魏杰和张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1993）、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导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新思路》（1993），以及吴树青、谷书堂和吴宣恭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1993）等。

3.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至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分化阶段。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强调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由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改革境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开始大量进入我国，除了西方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外，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企业契约理论等在内的各种流派理论著作都相继引入，这使得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国内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学者们不断增多。然而，新的理论背景必然要遭遇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新生事物，国内理论界又该如何应对呢？由此，对于如何构建我国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问题也就出现了不同意见。其中一派观点认为，应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吸纳部分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并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①；另一派观点则主张，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取代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基本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级性的”^②；也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无国界的，如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经济学，世界上可能就会出现100多种经济学”，不过“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人们之间会有内容、方法和观点上的差别，甚至会形成各种流派。但这种差异与国家的不同无关”，因此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并将其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流派。^③一时间，各种观点不一而足、众说纷纭，于是一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大讨论也就陆续展开了。

实际上，有关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名词，它甚至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我国早期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比较具有典范意义的，当属王亚南先生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④该书从讨论当作舶来品输入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使得国人的政治经济学修养程度受到限制，故没有产生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为探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环境。因此，我国有志于“中国社会经济之科学研究”的人，不应一味照搬模仿舶来政治经济学的教义和内容，而“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⑤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这一话题又被重新提

① 崔之元：《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载《中国书评》，1995（9）。

② 樊纲：《“苏联范式”批判》，载《经济研究》，1995（10）。

③ 张仁德：《也谈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载《经济学动态》，1999（3）。

④ 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载《经济研究》，2000（4）。

⑤ 王亚南：《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载《中国经济原论》，296~325页，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

起,但其含义已有所不同。具体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可以看到这一阶段对上述问题争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有关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改革应当何去何从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简单地讲,也就是要坚持原有基础上的创新、还是要彻头彻尾的革新?当前,则更是主要体现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他各流派分支的理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其相互关系的处理上。对此,张卓元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是不断吸收各方面的文明成果而丰富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吸收当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应当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方面,有许多成果是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的。……任务就在于努力使这种吸收用来丰富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我国经济科学,增强她的科学性、适用性,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①,这一阶段各具代表性的经济学著作和教科书的相继出版亦成为这种反映的主要体现。

在著作方面,一种发展方向是要求强调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如逢锦聚、林岗、顾海良、洪银兴等一批中青年学者 2005 年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经济学系列丛书”在理论界产生重要影响。此外还有程恩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2006)、王向成的《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1997)、张宇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2000)、戴达远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2000)、孟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2001)等。按照林岗教授的说法,其宗旨为“我们愿意在这个意义上(即从实践的角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统,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出适应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②另一种发展方向是,把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新近鼎盛起来的几个分支理论相结合形成的各具特色的经济学体系。其中,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相结合的,如张曙光的《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1999)、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1996)、林岗和张宇的《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2001)、刘元春的《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001)、袁恩桢和张道根的《交易活动与经济关系演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再探索》(2002)等;与发展经济学理论相结合的,如陈宗胜的《新发展经济学:回顾与展望》(1996)和《改革、发展与收入分配》(1999)等;另外,也有一些同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等新兴学科相结合而形成的经济学理论。而第三种发展方向则是,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我国现行改革所处的阶段联系起来,对社会经济体制结构变革进行动态研究,称为转型经济学或者过渡经济学。

在教科书方面,大体上主要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基本上仍参照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体系和格式,但在内容上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内涵,主要有伍柏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程》(1998)、王泓远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98)、陆立军和王祖强的《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纲》

^① 张卓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研究》,1997(6)。

^② 林岗:《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载《教学与研究》,2000(5)。

(2000)、王守梅和翟留栓的《政治经济学通论》(2000)等;而另一个趋向则是,在体系和结构上均打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二分法”(即将政治经济学分为社会主义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从而在结合我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对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行新的探索,主要有逢锦聚、洪银兴、林岗和刘伟主编的经济学基地版本《政治经济学》(2002)、于良春的《政治经济学》(2001)、张维达的《政治经济学》(2000),以及程恩富的《现代政治经济学》(2000)等。

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

根据有关学者对我国理论经济学的代表性期刊《经济研究》建国 50 年所载文章的统计分析,其间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方向和理论研究范式转换的文章中有三篇值得特别注意。^①其中一篇是樊纲的《“苏联范式”批判》(1995),它明确提出“苏联范式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马克思范式’”,从而宣告了在中国占据垄断地位达 40 年之久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破产,以及代表着过去一个时代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和研究范式的终结^②;再一篇文章是林毅夫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1995),这篇文章主要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家的使命、责任和本土意识,强调在规范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带动下实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并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作出自己的理论解释^③;还有一篇文章则是张曙光光的《立足本土,走向世界》(1999),它更加突出了我国理论界应当建立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学的整体水平还很低……因此,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实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④由此可见,重建社会主义中国自己的理论经济学和发展属于这一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已是迫在眉睫。事实上,这种要求理论范式、本土意识和学术规范等各个方面都力求尊重科学、尊重实际的学术呼声,同时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在新的世纪必然要遵循并且逐渐发展成熟的一个游戏规则。当前,具体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需要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建工作必将呈现出一种研究方向多元化,研究方法规范化、国际化与本土化并重的理论研究风格。

还应看到,我国过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传统就是引经据典式的哲学思辨,而且这种情况一度占据经济研究的阵地数十年。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必然要求以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如果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能够遵循这一根本原则,而只是教条式地引经据典,那毫无疑问将是没有生命力的。这也就涉及到如何看待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性质及其研究方法的问题,因此它或许正是今天我

^① 夏业良,王欣:《中国理论经济学 50 年发展轨迹的缩影——对〈经济研究〉刊载文章的统计分析与简略评论》,载《经济研究》,2000(5)。

^② 樊纲:《“苏联范式”批判》,载《经济研究》,1995(10)。

^③ 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 40 周年》,载《经济研究》,1995(10)。

^④ 张曙光:《立足本土,走向世界——1998 年中国经济学述评》,载《经济研究》,1999(8)。

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走出传统范式、实现理论创新的突破点所在。究竟什么是新的学术规范呢?张曙光指出,“所谓学术规范,就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一套制度规则和传统习惯,包括学术纪律、学术传统、学术道德、学术秩序,诸如学者的独立自由人格,为探求知识的角色定位,尊重知识发明的科学态度,恪守学术创作的基本要素和基本体例等。”^①张军也由此认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在国际上仍属相当落后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经济研究”还不被作为一种严格遵循科学程序和规则的寻求知识增长的系统过程,而且研究的程序化也还不被广泛接受。他主张,“在此情况下,我们所要努力的不是什么将经济学重新引回道德的、政治的道路,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而是脚踏实地地树立经济研究中的制度规范,提倡并鼓励经济研究中的逻辑经验主义精神,健全经济学家的理论素养。”^②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来我国理论研究学者队伍的专业化不断在增强。例如,改革初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与有关政策研究交织在一起的,迄今这种状况已显著分化,学者们不再满足于简单地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而是倾向于将它与逻辑证明和数理证明结合。同时,不同类型的学者之间逐渐形成比较明确的角色定位,如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中侧重纯理论研究型学者、政府研究部门中侧重政策型研究的学者等等。彼此间分工相对明确,从而在相互之间交流的过程中,就具有了更多的专业性语言。于是,以前研究资源重复、浪费的局面明显减少,从而大大地节约了研究成本并提高了学术研究效率。这一转变对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学者至关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在学者们之间形成相对一致的假定前提,或遵从相对一致的研究范式,最终对于新时期深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以及繁荣我国整个经济学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Baran, P. 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3
- [2] Dobb, M. H.,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37
- [3] 罗宾斯. 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4] [苏]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第 3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 [5] 崔之元. 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 中国书评, 1995 (9)
- [6] 樊纲. “苏联范式”批判. 经济研究, 1995 (10)
- [7] 谷书堂主编. 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 [8] 蒋学模.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经济学家, 1997 (2)
- [9] 李铁映. 中国经济改革的双重探索. 经济研究, 2004 (2)
- [10] 林岗. 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 教学与研究, 2000 (5)

① 张曙光:《中国经济学:199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张军:《走近〈经济研究〉——初读〈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冬季号。

- [11] 孙冶方. 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 经济研究, 1979 (8)
- [12] 谈敏. 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 经济研究, 2000 (4)
- [13] 王亚南. “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 载《中国经济原论》.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8
- [14] 卫兴华. 关于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 经济研究, 1981 (1)
- [15] 夏业良, 王欣. 中国理论经济学 50 年发展轨迹的缩影. 经济研究, 2000 (5)
- [16] 于光远. 我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经济研究, 1986 (8)
- [17] 张军. 走近《经济研究》——初读《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9 年冬季号
- [18] 张仁德. 也谈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 经济学动态, 1999 (3)
- [19] 张曙光. 立足本土, 走向世界——1998 年中国经济学述评. 经济研究, 1999 (8)
- [20] 张熏华. 《资本论》脉络.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
- [21] 张卓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经济研究, 1997 (6)

The Review of China's Market-oriented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in Last Three Decades

Luo Rundong, Guo Jianqiang

Abstract: In the past 30 years of economic reform, China's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on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s have played a positive impact on its performance and provided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eory. At the same time, the entire system of economic theory in which the status of new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Typical phenomenon is accompanied by the traditional func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weakened ideology, and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shows a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in which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normative growing. This situation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national 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ut will also affec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scipline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door policy and focus on the review of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